



評介 《裕仁天皇與近代日本的形成》

淡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林 呈 蓉



裕仁天皇與近代日本的形成

賀柏特·畢克斯著

林添貴譯 / 時報文化

9102 / 460 元

ISBN 9571335991 / 平裝

在 2002 年 2 月時報文化公司出版了一本賀柏特·畢克斯 (Herbert P. Bix) 博士之大作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的譯著作品《裕仁天皇》，譯者是擁有豐富譯著經驗的林添貴先生。這本譯作初版之後不久 4 月又再版，顯然臺灣的圖書市場上對於畢克斯博士著作的題才倍感興趣。

這本《裕仁天皇》全書一共是 4 篇 17 章、外加導論一篇，從 1901 年裕仁天皇出生的背景談起，直至 1989 年天皇駕崩為止，這長達 89 年的歲月也正是日本國從近代走向現代的一段重要歷程，而裕仁天皇不僅是這段歷程的見證者，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當事人」。因此，這本著作的內容可說是試圖透過裕仁天皇的傳記解讀近代日本歷史，大有一石二鳥的效益。原作品是由美國的 Harper Collins 公司出版，英文標題是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但是很遺憾地，其中文譯著作品的標題僅把「裕仁天皇」以大字給強調出來，而「近代日本的形成」這部份則以日文、小字、副標題的形式表現，令人感到有些美中不足。姑且不論其副標題的日語表現方式有些不自然，畢克斯

博士對「裕仁天皇」的生平介紹與「近代日本」的發展二者以相同比重平行論述的宗旨，也無法從中文標題中看出端倪，在忠於原著的意旨上，令人感到些許遺憾。

這本譯著厚達 580 頁，對於近代日本的發展，從社會、政治、外交各個層面剖析、解讀，然後再談面對各種問題時在決策過程中，天皇的立場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藉由這樣的書寫手法，讓讀者充分瞭解「裕仁天皇」的人格特質與「近代日本」的發展。整本譯著的內容，以裕仁天皇的一生為架構，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篇 皇儲教育 (1901 - 1921)。此一章節裡談了許多裕仁天皇的成長經驗，以及他所天賦的權威與責任。加諸於他身上的各種特殊教育模式，在在都是期待將他塑造成日本國理想的天皇形象。

第二篇 善意之治 (1922 - 1930)。從 1921 年裕仁正式成為攝政大臣開始，一方面他得彌補其父皇能力之不足，另一方面也得面對各種新時代、新思潮衝擊的挑戰。在經濟危機的觸媒下，裕仁必須面對暗濤湧湧的新民族主義浪潮、以及國內政黨與軍部之間的角力鬥爭。對臺灣的讀者而言，1923 年裕仁曾以皇太子身分行幸臺灣，這個經驗不僅在臺灣老一輩「多桑」世代的心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為臺灣留下許多足以見證的遺跡（如太子賓館、臺中公園等地標）。當時裕仁臺灣視察旅行的安排，最主要的用意一般認為是為了強化臺灣人的皇室信仰，以及表現出足資典範的完美道德形象。

第三篇 天皇之戰 (1931 - 1945)。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代表軍部獨走的時代來臨，裕仁天皇在欠缺正確判斷能力的情況下，隨著軍方起舞，把日本國帶向戰敗的不歸路。此一章節記錄了在每一次的關鍵時點中裕仁對於政府決策的思考與心理狀態。

第四篇 待驗人生（1945－1989）。日本戰敗之後的裕仁，一直忙著思考如何規避戰爭責任與維持皇室舊有的尊嚴。戰後他透過口述「獨白錄」、以及在周邊人員的協助下整理了「聖談拜聽錄」，以界定自己未來的歷史地位。

對臺灣的讀者而言，我們過去可能多從中國的主觀角度、以及膚淺的表象去看「裕仁天皇」與「日本近代」，但是透過畢克斯博士的作品，我們可以從西方的視點、以及較為深層的面向去解析同樣的問題。畢克斯博士的譯著雖然用了許多的第一手資料，但是由於每一個章節後面並沒有附上資料的出處，對讀者而言，書中論述的真實性還是變得比較接近「虛構」小說的範疇，到底書中所述內容的可信度有多高，則令人感覺狐疑。

畢克斯博士大作的中譯本中，雖然譯者、編者在很多時候都會親切地把原作者的敘述以「譯按」或「編按」方式加以補充說明，幫助讀者理解。然而，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畢竟譯著作品是源自英文著作，因此譯者一不注意便會誤譯了重要的歷史專有名詞。例如，在117頁第二行「裕仁離開台灣以後，在一九二三年五、六月份的《台灣日報》上，總務廳長賀來佐賀太郎肯定皇儲身為大日本帝國的道德與仁慈典範之重要性。……」，譯著中所說的《台灣日報》，應該是指《台灣日日新報》。又如，142頁第三行提及明治憲法第一條規定「日本當由垂諸永遠絕不破裂的天皇一系來統領與管治」，這段譯文很明顯地是從英文的譯文中再轉手翻譯下來的，顯得相當饒舌，也失去了其日文語句之原味。1889年2月頒佈的「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條很簡潔、明確地寫著「大日本帝國乃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

之（大日本帝国ハ万世一系ノ天皇之ヲ統治ス）」。從日文原文直接翻譯的感覺，與經由英文譯文再二手轉譯的感覺，即使意義上沒有大相逕庭，恐怕在文字感覺上也大異其趣了，其憲法原有鏗鏘有力的條文敘述之質感，蕩然無存。

除了歷史專有名詞不能忠於慣習用語之外，比較冷門的專有名詞則欠缺了英語原文之加註。例如482頁第一行「…政府在凱洛格－布里安公約和〔國聯〕公約裡已經接受的政策，根本不是新東西」，對於文中之「凱洛格－布里安公約」我們不敢奢求譯者或編者另行解釋，但是如果能夠把公約的英語原文標示出來的話，則可協助讀者對該公約之理解。

承如前述，翻譯外文著作時，要忠於「原味」，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差事，特別是專有名詞充斥的歷史著作，更是困難。除了用詞遣字必須忠於「原味」之外，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該隨時意識到把自己定義成作者的「分身」，也是很重要的。譯者的立場倘若失焦，經常會使讀者在閱讀譯著的過程中感到迷惑、困擾。例如265頁第9行「同時，因為一再與國軍發生小規模衝突而準備發動全面攻勢時，裕仁對於蘇聯可能干預的關切也減緩」，由於文中的地點背景是指中國的華北地區，因此文句中的「國軍」到底是指「中國軍」、「日本軍」、還是「美國軍」？譯者此時是站在美國人作者的立場說話、還是中國人立場說話、抑或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立場說話？令人費解。

閱讀譯著作品原是與國際接軌的一條最方便的捷徑，即使外語能力不好，仍可透過譯著作品打開讀者的國際視野。然而，成就一部如實而忠於原味的翻譯作品，使讀者能夠如同閱讀原作般地體驗原作者字裡行間的意旨，則非易事。在迎接全球化之際，與其動員全民學好外語，我們更期待出版商能與優秀的譯者合作，出版更多有趣題材的外語著作，以擴大臺灣閱讀大眾的國際視野。